

## 論王夫之《詩廣傳》借經說史之詮釋義涵

江江明\*

### 摘 要

晚清以降，王夫之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多半被視為足與黃宗羲、顧炎武等清初名家比肩而論，且其著作橫跨經史與文學等領域。清代唐鑑《國朝學案》謂其：「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留連顛沛而不違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不只推崇他的個人之學術成就，同時也稱許王船山人格典範之樹立。船山嘗謂「六經責我開生面」，故窮畢生之力研讀經書。其著作與《詩經》相關者，如《詩經攷異》、《詩經稗疏》《詩廣傳》，皆為後世所推崇。《詩廣傳》是王夫之重要的代表作，相較於《詩經稗疏》與《詩經攷異》等偏重辯證名物或字義審訂之著作，無疑具備了更強烈的個人詮釋觀點，《詩廣傳》二百七十三篇之中，出現了許多強調以「歷史」論證經典的文字，究竟是出於某種巧合，亦或凸顯王夫之個人之歷史觀點，其實相當值得探討。本文擬由詮釋的角度出發，說明王船山《詩廣傳》特殊之釋經之方式，以及當中蘊含之倫理觀點與個人歷史感懷。

**關鍵詞：**《詩廣傳》、借經說史、歷史觀點、詮釋義涵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

# Discussion on Interpretation and Implication of Wang Fu-Zhi's Employment of Classics to Explain History in *Shih Kuang Chuan*

Jiang Jiang-Ming\*

## Abstract

Since late Ching Dynasty, Wang Fu-Zhi has been discussed together with Maestros in early Ching Dynasty such as Huang Zong-Xi and Gu Yan-Wu, and his writings stretch over class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ang Chien in Ching Dynasty described him in *Guo Chou Xue An*, "he is devoted to philosophy and truth, researches thoroughly from ancient times to contemporary age, understand the causes and reasons of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suffers set backs but insists on benevolence, and faces obstacles but stands on righteousness." Not only did Tang praise Wang's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also approved of his model of moral integrity. Wang often said "The Six Classics is what inspires me to create a new order". He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classics, and his writings with reference to *Classic of Poetry* such as *Investigation on Classic of Poetry*, *Explanation of Classic of Poetry*, and *Shih Kuang Chuan* are highly prai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Wang's representative work *Shih Kuang Chuan*, different from *Investigation on Classic of Poetry* and *Explanation of Classic of Poetry* which emphasize discrimin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of names and matters as well as examination and revis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possesses a stronger viewpoint of his own interpretation. In 273 Chapter of *Shih Kuang Chuan*, a large number of words which use "history" to expound and prove classics appear. Either whether this is out of mere coincidences or whether this demonstrates Wang'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wor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a viewpoint of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explains Wang's special methods of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in *Shih Kuang Chuan* as well as ethical perspective and his personal historical reflection that lie underneath.

**Key words:** "*Shih Kuang Chuan*", employment of classics to explain histor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implication

---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論王夫之《詩廣傳》借經說史之詮釋義涵

江江明

## 一、前言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湘西石船山下，故又稱船山先生。清代中期以後，王夫之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多半被視為足與黃宗羲、顧炎武等清初名家比肩而論，且其著作橫跨經史與文學等領域。清代唐鑑《國朝學案》謂其「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留連顛沛而不違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sup>1</sup>，不只推崇他的個人之學術成就，同時也稱許王船山人格典範之樹立。船山嘗謂「六經責我開生面」，故窮畢生之力研讀經書。同治年間，經由曾國荃與曾國藩等人廣為搜佚，匯刻為《船山遺書》三百二十四卷，其重要著作如《周易外傳》七卷、《尚書引義》六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等。其中與《詩經》相關者，如《詩經攷異》、《詩經稗疏》《詩廣傳》，皆為後世所推崇。《詩廣傳》是王夫之重要的代表作，相較於《詩經稗疏》與《詩經攷異》等偏重辯證名物或字義審訂之著作，無疑具備了更強烈的個人詮釋觀點。

王孝魚在《詩廣傳·中華點校本說明》一文中推測王夫之重訂是書之時間，認為根據周調陽所見的抄本，當中末頁有「癸亥閏月重訂」六字，《詩廣傳》應當重訂於一六六八年秋：

一六六八年秋，船山寫成《春秋世論》和《春秋家說》，是年冬又寫成《續春秋傳左氏博議》。《詩經》和春秋的關係非常密切，不弄清楚《春秋》的情況，無法評論十三國風，所以很可能先集中精力完成了關於《春秋》的專門著作，然後才研究《詩經》。<sup>2</sup>

上述的看法認為王夫之《詩廣傳》與《春秋世論》或《春秋家說》之間可能有先後的承接關係，換句話說，王孝魚認為，《詩廣傳》中牽涉十三國風部分說明，必須要對春

<sup>1</sup> 唐鑑：《國朝學案小識》〈翼道學案〉，卷3，收錄於《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第2冊，（台北：明文書局印行，民74年5月），頁178。

<sup>2</sup> 王夫之：《詩廣傳》〈周南〉，卷1，《船山全書》第3冊。（長沙：嶽麓出版社，1996年），頁517。

秋時代的史料有某種程度的認識。因此，由此可以推斷出《詩廣傳》完整的成書年代必然晚於《春秋世論》等著作。這種推論當然提供了王船山著述時序的某種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卻也指引出另一個思考點，倘或《詩廣傳》果然成於《春秋世論》等作之後，那麼，王夫之的《詩經》相關著作就確實可能與其《春秋》觀點具有某種巧妙的關聯性。再者，《詩廣傳》二百七十三篇之中，出現了許多借經說史的文字，這些強調以「歷史」論證經典的文字，究竟是出於某種巧合，亦或凸顯《詩廣傳》之歷史觀點，其實相當值得探討。且這些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引用，嚴格來說，並不全然等同於傳統的看法。若以〈毛詩序〉等較明顯的例子進行比較，也許不難發現兩者的關聯性。〈毛詩序〉強調作者美刺意圖，傾向以歷史批評的角度，將《詩經》文本與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之間進行結合，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凸顯《詩經》作者對於政治人物的批判（或溢美）立場，以強調經典本身可能具備的倫理教化指向。但反觀《詩廣傳》，儘管亦強調《詩經》具有「盪滌滯而安天下於有餘者也」<sup>3</sup>的倫理意義，但其借經說史的方式則具有更寬廣的詮釋向度，並不限於《詩經》文本本身可能的歷史推測。相反的，《詩廣傳》有時甚至逸出經義本身的探討，轉而將焦點置放在個人歷史的感懷與歷史興亡的得失評判。《詩廣傳》與歷來傳統中針對經典文字本身進行詮釋的傳注典籍，嚴格來說並不相同，主要的原因在於，《詩廣傳》對於《詩經》經文的詮釋態度採取較為廣泛的策略。這種廣泛的策略，使得後人難以將《詩廣傳》定位為「純粹」的經傳著作，進而易將研究焦點置於作者本身對於義理闡發的部份。<sup>4</sup>然而，王夫之究竟是如何將「詩」與「史」兩者概念進行結合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3</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02。

<sup>4</sup> 例來探討《詩廣傳》義理思想之學者為數不少，台灣方面如曾昭旭《王船山哲學》（台北：遠景出版社，民 72 年。）當中論及船山之詩經學部分，即以《詩廣傳》作為研究之重點。陳章錫：《王船山詩廣傳義理疏解》（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1984 年。）。大陸學者如袁愈宗《詩廣傳詩學思想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2006 年）雖以「詩學」為其名，但內容多涉及《詩廣傳》之「情」、「神」等思想。單篇論文如余波：〈詩廣傳主旨新探〉（《船山學刊》2007 年 1 月，第 63 卷 1 期）、葛松：〈對詩廣傳中言情的管窺〉（《常德師專學報》，1984 年 5 期）、張俊虎〈試論王夫之的詩經比較研究〉（陝西：陝西師範學院教學與科研，1984 年，頁 74-80。）其它從釋經角度說明《詩廣傳》的文章，如黃忠慎：〈王夫之《詩經》學新探〉（《國文學誌》第 8 期，2004 年 6 月，頁 299-322。）將王夫之《詩經稗疏》、《詩經攷異》《詩廣傳》之詮釋策略進行比對，所得結論為：「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其《詩經》學著作的確兩種迥異的治學方式與內容，因此若說其為「漢宋兼採」的學風，並不符合事實，畢竟王夫之並未在某一著作中採取融合兼採的方式進行論述。所以，我們認為王夫之在研究《詩經》學的過程中，是明顯地分別使用兩種不同的治學方式，寫出兩種內容趨向大相逕庭的著作，這種情況不妨稱之為「漢宋分治」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因為其《詩經》學著作呈現出「漢宋分治」的情況，所以王夫之不同的《詩經》學著作，會因為學術風氣趨重差異，而有或昇或降的情況出現。也是就說當後代學者選擇學術研究的「典範」時，王夫之兩種極端的治學呈現，會讓學者很容易因其所重，而擇其所愛。而這點就是王夫之在《詩經》學史上，最為特殊也是令人感到最有興味的現象。」上述研究以「詮釋」作為探討重心者，除〈王夫之《詩經》學新探〉一文之外，其他多半將研究焦點置於「情」、「神」等義理探討。

勾連？又其以史證經所欲凸顯的政治倫理義涵究竟為何？以下，本文將以上述問題意識為出發，釐清王夫之《詩廣傳》以史證經的詮釋進路，以及當中隱伏的倫理立場與個人史觀。

## 二、《詩廣傳》借經說史之詮釋義涵

### （一）由「經」入「史」之詮釋特點

從釋經的觀點來看，早期儒者對於《詩經》與《春秋》之間所隱藏的關聯，幾乎都抱持正面的態度。《孟子·離婁下》說：「王者之述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sup>5</sup>這種認為《詩經》具有歷史意義之代表性觀點，歷來早已為人所熟悉。孟子的觀點與《詩大序》所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述，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sup>6</sup>這類的看法，背後的意義都是將《詩經》視為具有政治批判的實質意義，換言之，《詩經》之所以能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典範，主要還是在於其被賦予考正風俗得失的義涵，而這種義涵與所謂司馬談「《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sup>7</sup>基本上可以相互參照。歷代詩教觀點一再提醒我們，《詩經》具備了興衰治亂的教化功能，而由此開展的詮釋途徑，恰巧是將「詩」與「史」兩者的概念提升到足以相提並論的層次。既然「詩」與「史」同樣具有指導倫理意義，那麼在詮釋的過程中，能否徹底把梳「其指數千」的隱性義涵，似乎成了歷代學者最重視的部分。

從上述的角度出發，再回到《詩廣傳》的理解，我們或許不難發現王夫之在《詩廣傳》對於《詩經》詮釋的基本態度，基本上未脫上述的方法論指導。儘管，王夫之並未直接宣稱其以春秋史筆之法對於《詩經》旨趣陳述之意圖，但我們仍可以在文本的實際內容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這種現象說明了《詩廣傳》看待「詩」與「史」兩者之間，顯然存在一種特殊的關聯性。在《詩廣傳》卷一中，王夫之依循〈詩序〉之角度說明〈擊鼓〉之詩的深意：「悲夫！世亂道亡，怵亂以為恩怨，而義滅無餘矣。臣弑其君，子無對焉。子弑其父，臣無尤焉。……州吁弑君兄以立，臣民無詞以相誹毒，眾不戢而後〈擊鼓〉之詩作。衛先公之教泯，而誣上行私，不可止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sup>8</sup>。在論〈兔爰〉詩時，亦有「迄乎桓王，而後忠厚之澤斬矣。故隱公之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春秋是乎託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後春秋作』，謂桓王也」<sup>9</sup>。王夫之一再引用孟子「詩亡後春秋作」的觀念詮釋經典，說明《詩經》與《春秋》之間的承

<sup>5</sup> 洪浩培影印：相臺岳氏本《古注十三經》第五卷（台北：新興書局發行，1959年），頁73。

<sup>6</sup> 鄭玄：《毛詩鄭箋》（台北：學海書局，民90年9月），頁1。

<sup>7</sup>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39年）頁1336。

<sup>8</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321。

<sup>9</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343。

接關係，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恰巧是一種「詩」與「史」的結合概念，王夫之將「詩」與「史」的內在精神等而視之，並賦予二者相同的倫理指導功能。在實際詮釋文本時，《詩廣傳》更進一步將詩史結合的概念加以運用，呈現出借經說史的詮釋向度。在《詩廣傳》〈周南·論漢廣〉一文中，王夫之說：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志亢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知擇也。「之子于歸，言其秣馬」致飾也。……秉喬木之志，擇乎錯薪，而匪楚弗刈，然盛其車馬以弗自媿焉。漢之游女，豈一旦而獵堅貞之譽哉！

陶弘景之誕而僂也，种放之富而訟也，弗自飾也。幸而未有錯薪之芄芄焉，不然吾不知其所刈矣。余闕之死，不知命也。王逢之不仕，不知義也。弗擇其族而與之為伉儷，死不如其偷生，隱不如其尸祿矣。<sup>10</sup>

《詩廣傳》以陶弘景、种放、余闕與王逢等歷史人物，作為說明〈漢廣〉一詩的重要引證。陶弘景與种放皆為隱逸典型的代表，《梁書》說陶弘景「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sup>11</sup>但對朝廷深具影響力，他曾「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因而取梁高祖的信任。至於种放，《宋史》記載他晚年「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sup>12</sup>王夫之認為陶弘景怪誕好仙，种放為財而與人爭訟，都是「弗飾於己而擇於物」，他們的處世仍有沽名釣譽之嫌，與〈漢廣〉所言「匪楚弗刈」的精神並不相同。以《詩廣傳》的角度來說，〈漢廣〉一詩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在啟發後人「秉喬木之志，擇乎錯薪，而匪楚弗刈」，進而明白無論或仕或隱，都必須把握知「命」與求「義」的準則，而非僅求個人的毀譽。上述與〈詩序〉將〈漢廣〉理解為「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無思犯禮」等看法，嚴格來說，並沒有太大的關聯性。而藉由〈漢廣〉所引出的歷史雜感，反而成為此處的指涉核心。這種由「經」入「史」，進而賦予經典歷史義涵，無疑是《詩廣傳》相當特殊的詮釋方式，且

<sup>10</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05-306。

<sup>11</sup> 《梁書》（收錄於《仁壽本二十六史》，據元杭州路刊本印行，民 60 年 10）卷 51，列傳第 45，頁 8649-8650。「書萬餘卷，善琴，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sup>12</sup> 《宋史》（收錄於《仁壽本二十六史》，據元杭州路刊本印行，民 60 年 10）卷 457，列傳第 216，頁 24812-24813。：「放終身不娶，尤惡鬻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放終身不娶，尤惡鬻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

這樣的詮釋策略，在《詩廣傳》中為數不算少。在《詩廣傳》〈論標有梅〉中，王夫之引伯夷叔齊之事說明：

女有不擇禮，士有不擇仕。嗚呼！非精誠內專而揀美無疑者，孰能與於斯乎？殷俗之未革也，凶年之殺禮也，標有梅之女所以求於士也。伯夷不立於飛廉惡來之廷，雖欲為殷之遺臣而不可得，采薇之怨，其尚有求心而未慊者與？殆夫揀美已疏，增疑而未專者與？陶潛司空圖之早遯、吾未能信之以誠也。<sup>13</sup>

王夫之認為〈標有梅〉中「女不擇禮」真正原因在於「殷俗之未革也，凶年之殺禮」，因此急求庶士。而從〈標有梅〉詩中「求我庶士」熱切盼望，《詩廣傳》所看到的詩歌意義是「女有不擇禮，士有不擇仕。嗚呼！非精誠內專而揀美無疑者，孰能與於斯乎？」，王夫之引用《史記·伯夷叔齊列傳》中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sup>14</sup>的相關記載，表達自己對於伯夷叔齊等歷史人物的看法，認為伯夷叔齊賦采薇之詩，是因為他們還有「欲為殷之遺臣而不可得」的怨懟，因此，他們隱於首陽山，有其情非得已的苦衷。從「求我庶士」到「采薇而食」，《詩廣傳》對〈標有梅〉的探討實際上已經偏離了詩歌本身。這種現象，除了呈現出《詩廣傳》脫離傳統箋註義疏既定範式之外，更顯示出王夫之從經典出發，由經入史，進而強調個人歷史觀點的特殊面向。《詩廣傳》對於經典的詮釋企圖，並非僅是經典本身的義涵，換言之，由經典出發所涵括的歷史評判與歷史人物探討，才是《詩廣傳》所欲建構的主體義涵。

除了上述之例證外，其他諸如〈論谷風〉中對於屈原的評論「屈原之君臣，匪直君臣也，有兄弟之道焉；匪直兄弟也，有父子之道焉。」<sup>15</sup>從〈谷風〉的舊室之怨出發，再延伸到對於屈原的歷史評價，王夫之以「谷風之婦，惡足以言此哉」反襯屈原之忠厚之情，認為《離騷》中「怨靈修之浩蕩，終不察夫民心」如舜之泣旻於天，與〈谷風〉之棄婦不可同語。又或如〈論考槃〉「諸葛亮密矣，其未裕乎？裴度裕矣，其未密乎？夫裕以密，則用而天下世受其福，不用而天下不激其禍。」<sup>16</sup>的歷史人物觀點，以及〈論東方未明一〉中「嬴政之并吞，遽焉耳，陳仲子之哇其母食，遽焉耳；墨翟之重趺止攻，遽焉耳，……。」引歷史實例說明論君子不可求事遽成。類似的文字，幾乎成為《詩廣傳》經常使用的策略。

儘管，這類的策略運用，或許可以解釋為王夫之個人歷史學養的滲入，但若純粹以釋經的角度來看，《詩廣傳》由經而入史的詮釋策略，確實逸出傳統經典釋義應有的保守姿態，呈現出作者本人強烈的歷史觀點介入。而這種歷史觀點，與一般僅就義理方面進

<sup>13</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13。

<sup>14</sup>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826。

<sup>15</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25。

<sup>16</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37。

行延伸詮釋的「釋經」策略，嚴格說來並不完全相同。

## （二）以經寓理的歷史批判法則

其次，《詩廣傳》由「經」入「史」之詮釋策略，並非是就詩經本身可能的歷史或作者意圖加以說明，而是將詮釋的重心放在經典延伸出的歷史啟發性。換句話說，王夫之欲向我們揭示一種《詩經》的積極性義涵：所謂的經義不僅是可以日新的義理，更包含對於歷史批判的原則。這一點可以在〈論蒹葭〉一文中略見：

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擁之以今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宛在矣。如其周不可戴也，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即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燬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間，交臂失之，而孰與為理乎？無已，則逆以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恐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於不智也？蒹葭之詩，刺之早矣。<sup>17</sup>

上述的詮釋與其說是對於〈蒹葭〉一詩的說明，不如視為王夫之個人的歷史批判立場。《詩廣傳》對於〈蒹葭〉的詩旨理解，基本上仍未脫〈詩序〉的觀點。然而，從〈詩序〉所言「〈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sup>18</sup>出發，王夫之認為〈蒹葭〉一詩給予讀者的重要啟發，主要在於秦國「逆以守之」的歷史教訓。王夫之認為，從〈蒹葭〉一詩可以看出秦人未能依循文王武王之政治典章制度，反其道而行，逆勢以取天下，因此耗費了四百多年才得以統一天下。而獲取天下後，又不能審慎按前朝舊制治國守成，故政權只延續到秦二世便敗亡。倘或與〈詩序〉進行比較，那麼，相較於〈詩序〉針對〈蒹葭〉寫作意圖為「刺襄公」之簡略推測，王夫之對於〈蒹葭〉一詩的看法，顯然認為〈蒹葭〉可能延伸出更複雜的歷史批判觀點，王夫之認為〈蒹葭〉對於整個秦代的衰亡有「刺之早矣」的預示，換言之，〈蒹葭〉可供我們借鑑者不僅是秦襄公，而是可以延伸至整個秦朝覆滅的歷史教訓。

再者，在〈論齊詩多刺〉中，王夫之解釋齊詩多刺與晉詩多勸的原因，表面上是針對〈詩序〉所論及齊風等詩之詩旨進行討論，然而實際上，《詩廣傳》同樣無可避免的將個人對於歷史的批判性觀點融入其中：

齊多刺，晉多勸。刺及於其君床第之隱、兄弟之慝而無擇，殆夫「訐以為直」者

<sup>17</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71。

<sup>18</sup> 鄭玄：《毛詩鄭箋》，頁 52。

乎？乃夫齊之刺，猶刺其君以先王之法，人道之紀也。晉之勸，唯恐其不能自張大而獎之以樂，相與陰祕以圖其私，其志傾。

故君遼國者也，國遼君者也。下不能直，上正之，下未之詭，上譎之；五霸以降之民也。下直，上以取正；下詭，上相與譎；五霸以前之民也，諸侯未擅政，不能遼民，而民遼諸侯，猶一王之民而移諸侯，故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國遼之也。

譎者多勸，臧亦勸，否亦勸，示美於人，而相遁以私。正者多刺，隱亦刺，顯亦刺，無匿惡於天下，而不深天下之怨惡。故齊桓之霸猶能匡天下，是非未亂，國可用也。管、晏興而後譎勸作。管仲曰：「聲色狗馬不足以害霸」；晏嬰始為譎諫，以流為淳于髡之滑稽，而齊喪其齊矣。齊、晉交獎以譎，中分天下，而三代之遺直乃亡。故孟子羞稱管、晏，惡其遼天下也。<sup>19</sup>

王夫之認為，齊風中詩序雖多言「刺」，但齊國尚有先王法度，仍不致違背根本的倫理法則。而晉風之勸，則是急求表功，唯恐人之不知。這是因為晉文公詭譎而不正，晉國因之而移風改俗，故晉國多有欲求表功的「譎者」。而齊桓公雖取得諸侯中的霸主地位，但尚且能匡正天下，是非仍明，這是因為齊桓公還保有「正而不譎」的基本立場。然而管仲、晏嬰等臣子先後被重用，齊國喪失了原本正直的政治風氣，轉而以「譎而不正」的詭辯之辭惑亂君上，因此孟子才會有羞稱管晏等人的說法。上述的文字立場與其視為對《詩經》齊風的說明，不如說是王夫之個人對於歷史的批判觀點。《詩廣傳》對於齊晉的討論不少，對於晉國取得霸主之地位多有批評，類似的例子在〈論東方未明二〉也可得見：

何謂瞿瞿？目方注之，心遽營之；心期成之，目數奔之；居素而若驚，未觀而先察；忘遠而亟攻其近，方為而輒用其疑：是之謂「瞿瞿」也。

嗚呼！齊、晉之霸，胥此道焉而已，而晉之霸也尤下；取必一戰而不俟再，將欲覲王而畏以卻，與秦同仇而中道相猜。晉之所以霸，齊之所不屑也。齊以「瞿瞿」為狂，晉以「瞿瞿」為良，是非舛而崇尚異，故君子當晉文之世思齊桓焉。<sup>20</sup>

《詩廣傳》從《詩經》〈東方未明〉中的一句「狂夫瞿瞿」，引伸出對齊晉稱霸之歷

<sup>19</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57。

<sup>20</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55。

史觀點，以及對於晉國之霸的負面評價。王夫之認為晉國不但急於求成，且反覆無信，初與秦結為盟友，後又出師伐秦。而晉之霸主的地位是建立在以「瞿瞿」為良策的狂夫作為上，所以說「晉之霸也尤下」。《詩廣傳》一再強調晉國取得王霸地位之手段不如齊國，且晉文公之詭譎亦不如齊桓公之正直，這種對於歷史或歷史人物的批判觀點，所佔的篇幅幾乎超越討論《詩經》本身的文本比重。相較之下，關於〈東方未明〉的說明似乎只成了點綴性質，而論齊晉王霸的歷史觀點才是此處所欲強調的指涉核心。從《詩廣傳》由「經」入「史」的詮釋理路，進而延伸至以經寓理的歷史批判法則，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王夫之隱匿於經典說明下的歷史批判觀點。換言之，《詩廣傳》的「廣其經意」也並不如想像中的「廣泛」，而是仍有其基本的立場。這種立場顯示王夫之個人的儒家政治倫理觀點。不論是〈論蒹葭〉中「逆以守之」，或是〈論東方未明二〉中對於齊晉王霸的探討，都呈現出此類似的傾向。

### 三、同其情者喻之而已：《詩廣傳》之歷史感懷

再者，除了上述之部份外，《詩廣傳》在以史證經的詮釋過程中，亦無可避免的將個人歷史感懷融入經典詮釋之中。在〈論載馳〉一文中，王夫之嘗言：「載馳之怨婦，黍離之遺臣，沈湘之宗老，囚燕之故相，悲吟反覆，而無能以一語宣之，同其情者喻之而已。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曠古杳令，求影似而不得，奚況樛狂之百爾哉……。」<sup>21</sup>，而所謂的「同其情者喻之而已」，正好可以視為《詩廣傳》的重要特色之一。王夫之將其歷史批判的觀點寄託在經典詮釋上，一方面藉此表達自己對於歷史得失的倫理看法，但另一方面，卻又不可免寄寓個人歷史感懷於之中。這使得《詩廣傳》呈現一種特殊的面向：所謂由「經」入「史」的歷史觀察，並不單純只是追求一種客觀的表述，更包含了王夫之個人對於歷史得失的感懷。這種感懷基本上是感性的，並且帶有強烈的歷史情感因素。在《詩廣傳》中〈論碩鼠〉，王夫之從《詩經》〈碩鼠〉引出個人的沉重感嘆：

嗚呼！秦并天下，守令浮處其上，而民非其民。君淫於上，執政秉銓者乾沒於廷，以法為課最，吏無不法者矣；以賂為羔鴈，吏無不賂者矣。草食露處，質子鬻妻，園土經年而偶一逸，無所往也。旦出疆，吏符夕至，稍有逸者，亦莫與授田，而且為豪右之強食矣。將奚往哉？一日未死，一日寄命於碩鼠也。漢之小康，二帝而已。宋之小康，六十年而已。過此以往，二千年之間，一游羿之彀中，聽其張弛，而又申以胡亥、石虎、高洋、宇文贇、楊廣、朱溫、女直、蒙古之饕噬，天

<sup>21</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34。

地之生，幾無餘矣，不亦痛乎！<sup>22</sup>

在〈詩序〉中，幾乎也有將歷史事件或人物與文本本身進行結合的詮釋，但毛詩特定的指涉對象，很清楚的是文本作者的「美刺」意圖，而《詩廣傳》的詮釋，則從經典本身轉移至對於經典旨意的詮釋，有時甚至超越的就經典來談論的主軸，轉而偏向個人對於歷史興衰的感性文字。以〈碩鼠〉而言，〈詩序〉認為魏風〈碩鼠〉是「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殘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sup>23</sup>，可是王夫之讀〈碩鼠〉一詩所看見的卻是秦併吞天下後，人民餐風露宿，「一日未死，一日寄命於碩鼠也。」的悽慘景像。王夫之發出個人對於民族命運的感嘆，認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真正能稱得上太平歲月的，不過只有漢之二帝與宋之六十年。其他大部分的時間裡，不是遭遇國家衰亂，便是外族侵犯，而這種歷史回顧起來，不免令人感到沉痛。上述由〈碩鼠〉延伸而來的詮釋觀點，缺少對於《詩經》文本本身的歷史解釋，也不像〈詩序〉是針對作者所處時代進行寫作意圖之推測，而是將個人對於歷史之感懷融入其中。換言之，《詩廣傳》由「經」入「史」的詮釋策略並非僅強調「客觀」的歷史詮釋，相反的，《詩廣傳》充滿了個人觀點式的歷史「感悟」，類似這種情感較強烈的文字，難以將之歸類為純粹的歷史批判觀點。

再者，如〈論素冠〉一文中，王夫之循〈詩序〉所言「刺不能三年也」<sup>24</sup>，強調〈素冠〉對於後世的啟發意義在於「檜亡於東周之前，而三年之喪先亡，此幽厲之所為傷周道也。」<sup>25</sup>，因而從歷史的角度說明「禮」與「情」的重要性。

悲夫！情在而禮亡，情未亡也。禮亡而情在，禮猶可存也。禮亡既久而情且亡，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魯，秉禮之國也；宰予，學於聖人者也；忽然釋其「蘊結」，雖有可與「同歸」者而不樂與之同，迷而不復，素冠之刺不作，更何望於天下哉？

河北之割據也，百年之衣冠禮樂淪喪無餘，而後燕雲十六州戴契丹而不恥。故拂情蔑禮，人始見而驚之矣，繼而不得已而因之，因之既久而順以忘也。悲夫！吾懼日月之逾邁，晦天下順之，漸漬之久，求中心之「蘊結」者，殆無其人與！「蘊結」者，天地之孤氣也。君子可生可死而不可忘，慎守此也。<sup>26</sup>

<sup>22</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62。

<sup>23</sup> 鄭玄：《毛詩鄭箋》，頁 46。

<sup>24</sup> 鄭玄：《毛詩鄭箋》，頁 57。

<sup>25</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77。

<sup>26</sup> 王夫之：《詩廣傳》，頁 377。

在王夫之看來，〈素冠〉所言的「蘊結」之情，正是此詩的關鍵意義所在，是君子可死而不可忘的孤臣孽子之情。然而，針對王夫之所言〈素冠〉為「幽厲之所為傷周道也」，清儒還有其它的看法。姚際恒在《詩經通論》〈素冠〉一文中指出十點不可信之處<sup>27</sup>，並認為：

此詩本不知指何事何人，但「勞心」、「傷悲」之詞，「同歸」、「如一」之語，或如諸篇以為思君子可，以為婦人思男亦可；何必泥「素」之一字，遂迂其說以為「刺不能三年也」乎！。素冠者，指所見其人而言；因素冠而及衣、韠，即承上素字，以「衣」、「韠」為換韻：不必泥也……。<sup>28</sup>

姚際恒認為〈素冠〉一詩還有其他的解讀可能性，並不需要拘泥〈詩序〉的說法，且從文本本身來看，「勞心」、「傷悲」等文字用語，也可解釋成思君子等其他義涵，不需限定在〈詩序〉詮釋的既定框架中。上述論詩的立場，儘管與詩序派顯然不同，但基本上還是就經義本身進行的探討。相較之下，《詩廣傳》不但以「詩旨」的倫理立場為前提，甚至由此延伸出個人的感性閱讀，王夫之將〈素冠〉的閱讀重心放在詩中所提及的「蘊結」之情，並舉唐代中期以後河北三鎮割據，以及燕雲十六州之例說明「人始見而驚之矣，繼而不得已而因之，因之既久而順以忘也。」的安逸心態，強調「吾懼日月之逾邁，晦天下順之，漸漬之久，求中心之「蘊結」者，殆無其人與！」的個人憂懷，類似的詮釋嚴格來說，當然不能視為純粹的歷史批判觀點，而是傾向個人式的歷史感嘆。這種歷史感嘆並非以辨明客觀「經義」為前提，而是強調個人對歷史興亡的情感抒發。其他類似的例子，再如《詩廣傳》〈論谷風〉：

王以之衰，霸以之興，後世以之崛起為天下君。世愈降，道愈偷，生其間者愈蹙矣。周室亂，王化不行，忠厚之澤斬，谷風之刺興焉。「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而上下離，臣友散，周室不可為矣。晉文以之，而渡河棄秦，舅犯測之，臨河而辭，然而霸矣，而猶未足以王也；漢高以之，醢越蒞信，繫何於請室，張良測之，絕穀而逃，然而終為天下君，傳祀四百。

嗚呼！自是以降，晨加膝，夕推淵，無不為己，利在則讎親，利去則親讎，無不用己。唐未定四海，而劉文靜亟誅；宋未一九州，而石守信早廢；待狡兔之死而烹走狗，抑成虛語，圖之惟恐不先。豈繫谷風？其為飄風乎！盡心以事人者，一

<sup>27</sup> 姚際恒：《詩經通論》，卷7，姚際恒著作集第1冊，頁223-224。（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83年。）

<sup>28</sup> 姚際恒：《詩經通論》，頁224。

游羿之彀中而不保其旦晚，悲夫！<sup>29</sup>

王夫之循〈詩序〉「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的脈絡，說明「忠厚之澤斬，谷風之刺興焉」的原因，且從歷史的角度論證，周世之後王道日衰，取而代之的便是以強霸的崛起。而世風日衰，政治爭奪的手段愈演愈烈，晉文公渡河回國後，臣子因窺其所為，故臨河而辭。但是歷史的結果卻是晉國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而晉君之手段尚不足以成為國君，到了漢高祖，大殺功臣，逼使張良以退隱為由，逃奔至山林。可是這樣的手段卻使漢高祖成就帝王事業，漢之國祚亦維持了四百多年。王夫之感嘆所謂的「狡兔之死而烹走狗」恐怕也是虛浮之語，在以利為先的前提之下，君臣之間早已無朋友之信可言。人臣者儘管盡心事主，只要牽扯到利益，結果還是如同彎弓之內的獵物一般，朝夕不保其命。上述的角度幾乎是將個人對於歷史的感懷寄予〈谷風〉的詮釋，與《詩廣傳》中〈論碩鼠〉或〈論素冠〉等相類似，都不是在追求一種客觀的經義解釋，而是以強調個人解讀立場為優先，表達對於歷史得失的感歎。因此，《詩廣傳》從經典出發，進而延伸出個人的歷史觀點，嚴格來說，並不是為了追求客觀的歷史態度或經義理解，相反的，王夫之借用經典所寄託的個人歷史感懷，才是《詩廣傳》所欲表達的核心所在。

#### 四、結語

《詩廣傳》共有五卷，第一、二卷論《周南》、《召南》和《十三國風》，第三卷論《小雅》，第四卷論《大雅》，第五卷則論《周頌》、《魯頌》、《商頌》。在實際詮釋《詩經》的部份，《詩廣傳》並未完整將三百零五篇的篇章全數說明，而是僅就其中二百三十七首進行討論，其中有相同詩篇進行多次詮釋者，如論周南〈關雎〉、〈采芣苢〉，邶風〈何彼穠矣〉與〈燕燕〉，鄭風〈采葛〉、齊風〈東方未明〉。亦有合論的情況，如論鄭風〈楊之水〉、〈野有蔓草〉、〈溱洧〉三篇、以及豳風的〈東山〉與〈七月〉。<sup>30</sup>就上述情形來看，《詩廣傳》在釋經的過程中並未「逐一」且「全面地」進行說明，形式編排上也沒有過多限制。內容方面更是無所不包，雖是以《詩經》各篇名作為詮釋出發點，但在衍義的過程中，則滲入了個人對於歷史、政治、哲學等各方面的見解。縱觀《詩廣傳》全文，借經說史之文字者不乏少數，這種策略所顯示出的重要義涵，並非僅是以客觀立場解釋經義，而是有其個人觀點之呈現。《詩廣傳》將詮釋的重心放在經典延伸出的歷史啟發性，且其將《詩經》文本與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之間進行結合時，並不受限於《詩經》文本本身可能的

<sup>29</sup> 洪浩培影印：相臺岳氏本《古注十三經》第三卷（台北：新興書局發行，1959年），頁116。《左傳》記載：「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洩從君，巡於天下，臣之最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父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sup>30</sup> 王夫之：《詩廣傳》〈周南〉，卷1，《船山全書》第3冊。（長沙：嶽麓出版社，1996年。）

歷史推測，有時甚至逸出經義本身的探討，轉而將焦點置放在個人歷史的感懷與歷史興亡的得失評判。對《詩廣傳》而言，經典所延伸出的效用不但是個人處世的哲學，更可以做為歷史的借鑑。王夫之將其歷史批判的觀點寄託在經典詮釋上，一方面藉此表達自己對於歷史得失的倫理看法，另一方面，則將個人歷史感懷寄託於其中。這種由「經」入「史」的詮釋方式，深刻呈現出王夫之個人對於經典之特殊體會，以及其企圖將「詩」與「史」兩者進行結合的內在義涵。

